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阿拉贡研究

沈志明 编选



沈志明编选



阿拉贡研究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阿拉贡研究
ALAGONG YANJI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25印张 4插页 62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10190·219 定价：5.40元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出 版 说 明

本丛刊以编译介绍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任务，内容包括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论、代表作以及有关资料，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专题，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学史问题为对象。

本丛刊由柳鸣九、罗新璋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和
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



阿拉贡像



左起：阿拉贡，爱尔莎，勃勒东，艾吕雅，努淑，1930年5月



阿拉贡和爱尔莎1935年
与罗曼·罗兰在一起



阿拉贡和爱尔莎1953年与
莫里斯·多列士在一起



阿拉贡1936年在家中。墙上左为马雅可夫斯基肖像，右为人民阵线的宣传画



阿拉贡1956年在和平进军途中演讲



阿拉贡（左起第四人）1946年7月14日在游行队伍中



阿拉贡（左起第三人）1968年5月9日向巴黎大学生演讲



阿拉贡（白发老人）1972年在法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编选者序

沈志明

阿拉贡逝世的第二天，巴黎一家报纸以赫然引人的通栏标题写道：“二十世纪的雨果逝世”。另一家期刊把二十世纪的法国称为阿拉贡世纪，黑体大号字的编者按指出，伏尔泰和雨果以他们七十年的文学生涯和战斗历史分别给十八、十九世纪冠以他们的名字。那么我们的世纪呢？萨特开始得太晚，纪德去世得太平，阿拉贡以七十年的文学生涯和战斗历史给我们的世纪冠以他的名字。

把阿拉贡比喻为“二十世纪的雨果”，在丰富的法兰西语言中大概再也找不出比这更高级的形容语了。阿拉贡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雨果”当之无愧，无论他们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作品的革命力量和社会作用，还是他们精神和政治的演变，基本上都可以相比。他们都经历了自己时代所有的风风雨雨，他们的一生都有如厚厚的一本历史书，他们的著作都仿佛是自己时代历史绚丽多彩的画卷，都象大海那么丰富。

一、曲折而发光的一生

1897年10月3日，巴黎十六区区政府的出生人姓名簿上登记了一个新生儿的姓名：路易·阿拉贡，男性，父母姓氏不详。这个谜多年后才被揭开，原来伪造阿拉贡姓名的正是当年显赫一时

的巴黎警察局局长、议员路易·昂德里厄，此公还肩负过多起重大外交使命，算得上一位人物了。母亲玛格丽特·图卡是良家闺秀。看来婴儿是爱情的产物，要不然非法父母为什么让他沿袭父亲的名字“路易”呢？他们哪想到儿子背上了私生子不好的名声，一辈子心灵上蒙着阴影。据说，阿拉贡只允许他的母亲、爱尔莎和为数极少的至友喊他路易，对其他人，他只是阿拉贡；他的著作一律只署名阿拉贡，从来没有“路易”的字样。母亲对外人讲，阿拉贡是孤儿，其父母死于非命，她把他当作兄弟收养。她一人主持一所家庭式膳宿公寓，维持多口人吃用，生活颇为清苦。阿拉贡虽然备受母爱，但吐出的第一句话却是谎言，称他母亲玛格丽特和两个姨为姐姐。他在谎言的诱导下牙牙学语，在谎言的指引下起步做人。玛格丽特不时带他去布洛涅森林散步，在那里她常常会见他的教父兼监护人。他在一边玩，他们则促膝谈心，有时十分亲热，有时争吵起来。他几次窥见母亲暗自流泪。有一次阿拉贡病了，教父来看望他，发现他床头虔诚地挂着一张大胡子男子肖像，便问他这是谁，孩子天真地回答，是他去世的父亲。教父兼监护人顿时大发雷霆，摘下肖像，扬长而去。过了几天，带着自己的肖像，挂同一个位置上，就这样，把他的“父亲”从天堂中赶了出去，从此他成了一个无根的人，飘忽在人间。不过话说回来，这位所谓教父不尽然是铁石心肠的人，除了在经济上接济阿拉贡母亲和供他上学外，还提携他的哥哥（即舅舅）埃德蒙当上区长。

阿拉贡天分极高，称得上神童。假假真真的氛围给他丰富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任凭他在假想的天国中驰骋。五、六岁上他就向“姐姐们”口述短篇小说，七岁开始写长篇，竟然还能达到可发表的水平。他早年就发现，创作能使他落实想象出来的秘密，通过想象揭示假话背后的真情，弄清假象掩盖的真实。在

他，写作是无师自通的事。其实“导师”是有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他喜欢读书，博闻强记，巴雷斯、狄更斯、高尔基等人的书，他爱不释手。一次作文竞赛获头等奖，奖品为一本巴雷斯作品选，题为《二十五年文学生涯》。他后来回忆道，这使他终生难忘。这本书给他开了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定了他生活的方向。然而，巴雷斯自我崇拜的思想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不良的烙印，使他迈向生活更加艰难。

中学毕业。挑选什么专业呢？玛格丽特要他学医，认为医生是生活的主人，不愁钱，不求人，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作家则为他人工作，有求于人，依附他人。但阿拉贡一听到医学，便联想到血和脓，觉得搞创作才有男子气概。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他仍到巴黎大学注册攻读医科。1916年5月10日他在一家医院会见崇敬已久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就更不想学医了。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他应征入伍，先被派往慈谷军医院学习助理医务，在那里结识了勃勒东，并由勃勒东介绍，认识苏波，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不久他们都奔赴前线。这时阿拉贡年满二十岁，法定成年。昂德里厄先生嘱咐玛格丽特向他道破出生的秘密，阿拉贡气愤难平，心想在他去送死的时候，让他明白他身上有这个老东西男性的印记，叛逆者的生涯就此发轫。他尽管厌恶和反对这场战争，但表现得十分英勇，荣获了十字勋章。战后继续学医，成绩优异，但放弃会考，立志成为作家。

从1919年至1924年期间，在一般法国人心目中，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界限并不清楚。超现实主义这个词首先在阿波利奈尔的《蒂蕾西娅的乳房》的前言中出现，即1917年。该运动打出旗号则在1923年，勃勒东的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于1924年才正式发表。但勃勒东和苏波共同发现“自动写作”，即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哲学”的基础，是在1919年。所以超现实主义

作为异军突起，应从1919年开始算。限于篇幅，我们只简要叙述阿拉贡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

阿拉贡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运动的一名主将。他跟朋友们一道，作为时代的叛逆，站在统治秩序的对立面。他在这群才情横溢而桀骜不驯，标新立异而自命不凡的青年人中间，最为激进，向传统、向权威挑战最具胆识，制造哗然最有办法，但对朋友既热忱又随和，很讨人喜欢。不料一天，勃勒东坦白承认，他跟苏波背着阿拉贡搞“两人合伙自动写作”，这对阿拉贡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被剥夺姓氏、财产继承权和其他合法权利之后，现在连最好的朋友也瞒着他在搞一鸣惊人的事情。他怒火中烧，妒忌如焚，从火一般炽热的情感中迸发出对独立自主的渴望。他表面上仍跟朋友们搞得火热，但暗中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决心闯出一条路来。1919年他在他们合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六岁时口述的文章《多么圣洁的灵魂》，作为对《磁场》的报复，谁能否认他在“自动写作”方面占领先地位呢？1920年抛出奇崛怪谲的《阿尼塞或西洋景，小说》，谁能不承认他首先为不是文学的文学树立了样板呢？连勃勒东也赞不绝口，承认阿拉贡为佼佼者。1924年抢在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之前发表《一次梦幻的浪潮》，阐述超现实主义的理论，谁能说他不是该运动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呢？同年 he 为了显示反传统的坚决，当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之际，竟对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破口大骂，甚至“鞭尸”，发表《你可曾鞭尸？》。过激的言词层层加码，居然顺带骂赞扬法朗士的莫斯科为“莫斯科痴呆”。失言闯祸，招来许多非议，有说他反共反苏，有说他朝三暮四，好出风头，是风派人物。当时他的主要倾向属好出风头的无政府主义，这不假，至于反共反苏，未免言过其实。如果说这篇“檄文”有什么政治目的，那可以说是暗中针对他的生父，因

为这位议员酷爱法朗士这类作家。我们倒可以从阿拉贡的谩骂声中辨别出离经叛道的呼声。不应忘记，阿拉贡和勃勒东怀着极大的热情列席了1920年12月16日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阿拉贡聆听了德国共产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在大会上的发言，受到极大的震动，增加了他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促使他于1921年与达达运动决裂，自行探索超现实主义的革命之路。

这个时期和稍后一段时期，阿拉贡在发掘现代文学之精华方面比他的朋友们更加成绩卓著。他博览群书，见地独特，大胆肯定某些作家的价值，诸如马拉梅、洛特雷亚蒙、韩波、阿波利奈尔、雅里、勒韦尔迪等。这些人如今早已无可置疑地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但在当时很少为人所知，或不为人所知，而超现实主义者们则在《文学》杂志上高度评价上述作家，譬如重登洛特雷亚蒙的《玛尔佗萝之歌》和第一次刊登他的《诗集》（又名《一本未来的书的序言》）。除超现实主义者之外，“当时谁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没有人，根本没有其他人”。^①他们还肯定了十九世纪其他许多作家，如德·奈瓦尔等，甚至十八世纪的萨德等。“真正使浪漫主义驰名的是超现实主义者，我指的是介绍浪漫主义实质，不只限于教授概论”。^②所以阿拉贡多次驳斥有人指责他和他以前的朋友们毁坏文学。

1924—25年爆发的摩洛哥战争引起阿拉贡等人极大的愤慨，他们坚决反对法国殖民军镇压要求自由的摩洛哥人，再次跟共产党人接近，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然而，勃勒东对他们参加法国共产党提出不少先决条件，因没有得逞而恼怒，对阿拉贡跟负责《人道报》文化版的巴比塞接近耿耿于怀，甚至谩

① 《阿拉贡跟阿邦的谈话》第29页。

② 《跟弗朗西斯·克雷米约的谈话》第18页，这篇谈话已全文译出，收在本书内，以下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骂《人道报》。这个时期，勃勒东以领袖自居，越来越霸道，阿拉贡不同意他的主张，为表现其独立性，1926年发表《巴黎的土包子》，他运用幻想、幻觉描写外部世界，从而亵渎《磁场》，因为他把内心深处的意象投射到真正的大千世界，“磁场”在这里变成歌剧院、舒蒙岗、花卉草坪、柏油马路等等，这对勃勒东的“圣条”不能不说这是大逆不道。这本书发表后，反响强烈。与朋友们相比，阿拉贡在创作上已独占鳌头。但他意识到，大凡反对因循守旧的人，最后多为资产阶级“回收”，为了避免这个危险，干脆破釜沉舟，于1927年1月6日参加法国共产党。勃勒东、艾吕雅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在他之后也入了党。但他们几乎全部很快都退党了，阿拉贡则一直留在党内，近半个世纪跟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然而，阿拉贡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入党却还有很长一段艰苦的路程。1926年阿拉贡发疯似地爱上了南希，一个英国船王的女儿。他们经常外出旅行，有时跟好友安德略在一起，过着最放荡不羁的生活。二、三月份他用笔名发表一部色情小说，是长河小说《捍卫无限》的一部分，这说明他心灵空虚，思想苦闷。阿拉贡确实十分矛盾，写小说的愿望抑止不住，而《巴黎的土包子》已经得罪勃勒东，写小说是犯忌的，继续写就意味着被开除出超现实主义的革命道路。在政治上，尽管勃勒东指出：“马克思说改造世界，韩波说改变生活，在我们，这两个口号是合二而一的。”^① 阿拉贡却清楚地看出，超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一码事。如果想按共产党的路线行事，就必须跟自己的过去决裂，就必然疏远他的朋友们，而在感情上，他仍然倾向他们和自己的过去。1927年11月在马德里，他百般痛苦，一举烧毁一千

① 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81页。

五百页《捍卫无限》的手稿，随后整整六年没有写小说。诗人爱慕南希的美貌，美人喜欢阿拉贡的英俊，这是他们唯一的爱情基础。南希挥金如土，他跟着沾光，但他执著的爱使他不能容忍南希同时与其他男子相好。1928年夏天他们在威尼斯度假，南希居然跟一个美国黑人钢琴家好上了，这在二十年代对白种人来说，无疑是一桩丑闻。阿拉贡忍无可忍，服安眠药自杀，因药量不够未遂。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回到朋友们中间。绝望之余，对现存秩序、传统文化包括法兰西语言在内，发起猛烈的攻击。在超现实主义者小集会上，阿拉贡和勃勒东的言论一个比一个激烈，阿拉贡写了《风格论》，其虚无主义的色彩超过了勃勒东本人。

1928年11月5日，阿拉贡推门走进位于蒙巴拿斯刚新建不久的“穹顶”咖啡馆，听见一个操外国口音的人喊他：“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请您坐到他在的桌子。”他应邀前往。后 来回 忆时写道：“我哪里知道这次相遇将使我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化。第二天稍晚一点，也在这乱哄哄、穿堂风嗖嗖的地方，我遇见爱尔莎·特里奥莱，从此我们不再分离……”。^①以前人们常说，马雅可夫斯基对阿拉贡影响颇大。阿拉贡本人出于对苏联诗人的敬意，未加否认，其实对这位苏联诗人了解甚少，只听说他对成千上万的群众朗诵诗，深受人民喜爱。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后，爱尔莎翻译了他几首诗，阿拉贡这才读到他的作品，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很晚才首次在阿拉贡的作品中出现^②。而爱尔莎对阿拉贡的影响倒确实很大。1928年11月6日是阿拉贡个人生活、政治生命和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爱尔莎在阿拉贡深深陷入爱情危机、精神危机和创作危机的

① 《苏维埃文学丛书序言》第6页。

② 参见《爱尔莎的眼睛》中的《中途停靠》。

关键时刻给他注入新生的血液。她切中阿拉贡的要害，针对他的症结，在两个方面对他施加影响。其一是伦理影响，爱尔莎看出，阿拉贡虽然组织上入党，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但超现实主义的老一套仍根深蒂固，所以他看清超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帮助他清算《玛尔佗萝之歌》的作者洛特雷亚蒙的影响，使他明白光诅咒丑恶的人间不能改变丑恶的人间，从个人主义出发反对因循守旧仍属资产阶级的伦理范畴，因此必须建立集体主义的理想才能根除无政府主义。阿拉贡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二是文学影响，爱尔莎发现阿拉贡有写小说的天才，但被超现实主义的框框禁锢着，作茧自缚，埋没才具。所以她决心敦促阿拉贡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脱离她所讨厌的勃勒东。1930年爱尔莎因家庭事务，要求阿拉贡陪她去莫斯科。苏方邀请他们参加国际革命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阿拉贡受到极大的震动，回国后却遭到朋友们的批评，指责他不应该以超现实主义者的名义在大会上说亲苏的话。这样他跟勃勒东等人第一次出现裂痕。次年阿拉贡再度访苏，回国后发表诗集《有迫害狂的受迫害者》，其中一首题为《红色阵线》的诗引起非议，他被指控煽动军队违抗命令和蓄意挑唆行凶，受到法律追究。勃勒东挺身而出，为他的朋友辩护，拟草传单《阿拉贡事件》，争取到三百名知识分子的签名，维护阿拉贡做诗的自由，但严厉批评《红色阵线》的诗意，指出这是诗的退化，写这类应时诗，足见“诗的贫困”。阿拉贡积极应战，连连写出传单诗，赞颂法国共产党和苏联，至此，他跟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们正式决裂。

他们的决裂与其说出于政治原因，毋宁说因为文学观迥异。他们的政治观点当时基本一致，《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改名为《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这意味着他们认识到，单凭改变

语言和揭示潜意识不能改造社会，文学必须为革命服务。但是在如何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上，阿拉贡和勃勒东有着根本的分歧。勃勒东认为，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动和共产党人的行动应当在两个不同的战线并行不悖地开展，前者旨在改造“人的状况”，后者旨在改造“社会状况”，阿拉贡则认为两者休戚相关，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为人类彻底解放而斗争意味着人类首先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解放而斗争。他批评超现实主义者躲进文艺的象牙之塔，不联系实际，孤芳自赏，而勃勒东则坚持说把诗当作革命的附属物是对诗的侮辱，歌颂斯大林或赞颂新水坝之类没有多大意义，文艺不是宣传品。他们在文学活动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根本的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各奔东西，势在必然。

阿拉贡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窄狭的胡同，踏上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挣脱了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束缚，投身于集体主义的事业。1932年第三次访苏，进修新闻专业。1933—34年任《人道报》记者，同时领导革命作家联合会，团结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在巴黎建立文化之家。次年，文化之家的活动扩大，团结了更多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1935年爆发阿比西尼亚战争，阿拉贡起草抗议宣言，由著名作家儒尔·罗曼署名。同年跟马尔罗等人一起创立国际保卫文化作家协会，发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论著。1936年人民阵线选举获胜后，阿拉贡和爱尔莎应邀访苏，病重的高尔基想见见他们，遗憾的是，他们到达时，高尔基已逝世。西班牙战争爆发，他们赶回巴黎，又风风火火地赴西班牙，代表国际保卫文化作家协会给西班牙知识分子赠送物品。同年阿拉贡跟著名活动家和作家让-理查·布洛克筹备《今日晚报》。1937年至1939年多次参加或主持国际保卫文化作家协会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深受第一次大战之害的阿拉贡曾发过誓，一旦出现新的大战危险，他将竭尽全力呐喊，加以阻止。8